

# 以文化软实力赋能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时强调“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传承弘扬红色文化”。上海有着悠久的海洋文化、航运文化历史,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需要软

实力作为支撑。上海海事大学组织学者就海洋文化、航运文化进行探讨,以丰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文化底蕴。本报特刊发部分成果,以飨读者。

## 传承和弘扬上海红色航运文化

李秀芳

运输、国际船舶管理,设立国内首家异地缴纳社保的外资船舶管理公司,设置首个取得海员外派机构资质的外商独资船舶管理公司,均属于行为形态的航运文化,展现了上海持续推动航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洋山港建设者的拼搏精神、振华港机追求卓越的精神作为精神形态的航运文化,诉说着上海航运从业者精益求精、攻坚克难的优秀品格。

上述航运文化或以航运地标的形式存在,或表现于具体航运业务的实践中,或隐藏于上海航运业发展的规章制度中,或体现在航运精神的传承中,内容不同,形式各异,但均体现了上海红色航运文化之魂,即在航运业的发展中一以贯之的创新精神。

### 创新赋能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上海航运业之所以历经百年长盛不衰,并在新时代更加显现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强劲的发展能力和深厚的发展潜力,离不开经久不息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这种创新,是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到战术的全面创新。

在产业布局方面,上海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以上海港为基础的航运业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定位成为为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的战略目标。

在港口空间布局方面,上海顺应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趋势,适应国际集装箱向大型化发展的方向,突破上海港发展瓶颈,建设洋山深水港,开创了远离大陆依托海岛建港和陆岛联动管运、港城同步发展的模式,实现了上海港基本完成由河港向海港的战略转变。在产业内涵方面,上海改善口岸环境,促进航运市场信息流通,完善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实现从货物装卸向提供服务的转变,港口功能由低端向高端发展,有效提升了航运要素集聚的速度。

由上海航运业发展的总体趋向来看,上海红色航运文化中流淌的创新基因,给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供了不竭动力,助力上海基本建成国际航运中心,形成要素充分集聚、功能相对完善、体系比较健全的航运业发展新格局。

### 以红色文化涵养航运硬实力

面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由“基本建成”到“全面建成”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应该进一步充分挖掘上海红色航运文化中的创新基因,讲好上海航运历史发展中不断推陈出新的故事,提升上海航运业软实力,并将创新思维转化为创新能力,助力上海航运业的发展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一是要依托上海海事大学、中国航海博物馆等机构的专业团队,深入开展上海红色航运文化调查,扎实推进上海红色航运文化学术研究,

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通过挖掘上海红色航运文化资源,探寻上海航运业发展中的创新精神,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全面建成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为实现“文化强航”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要通过全媒体传播上海红色航运文化,讲好航运业创新发展的故事。要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配合,讲清建立洋山深水港的背景,讲清设立北外滩航运论坛的动因,讲清党和国家对上海航运的重视,增强红色航运文化的传播力、辐射力和影响力,让上海市民、航运从业者充分认识创新之于全面建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意义和价值,增强航运的认同度、支持度和参与度,吸引越来越多的航运市场主体参与到上海航运业发展的实践中。

三是要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继续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全面建成。要以发展智慧航运和绿色航运为指针,以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打造航运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高地,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能力;要拓展航运信息服务,创新航运金融服务,强化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要坚持科技引领作用,推进航运中心建设可持续发展;要完善航运发展环境,深化航运制度创新,全方位提升航运发展软实力。惟其如此,才能促进上海航运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具有上海特色的航运品牌和航运规则,增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在全球航运业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海事大学基地研究员)

### 创新是上海红色航运文化之魂

上海航运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深厚的红色航运文化资源。洋山深水港、上海航运交易所、北外滩航海公园等均属于物质形态的航运文化,以其独特的存在展示了上海航运业发展的历程。上海国际船舶登记部籍港制度、上海港口专用码头管理办法、散装液体危险化学品运输货主(码头)高质量选船机制管理办法等制度形态的航运文化,展现了上海航运业持续推进制度性开放的方向。向外资开放国际海上

## 中国海洋民俗文化的价值基础

康慧芳

中国自古以来就与海洋发生着亲密的联系。古人有“云从海上出,人物镜中来”的想象,也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深情,或悲或喜的诗句,记录了古人与海洋的特殊情感,展示了先民对海洋的审美自觉与文学想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饱含开放、包容、进取、冒险、智慧的海洋文化。海洋民俗是渔民通过集体记忆塑造的海洋习俗文化,共同的地域、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生活习惯等构成了渔民对涉海生活的普遍认同。

### 天人合一 是涉海生活的普遍认同

《淮南子·精神训》曰:“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万物相通,人与海洋亦是如此。沿海民众依海而生,形成了涉海群体普遍认同的物质资料的获取方式,即特定的衣食住行,反映了渔民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成为“天人合一”的生动注脚。

受陆海气候差异影响,渔民的服饰不同于内陆居民,而由于中国海岸线漫长,南北地区渔民的服饰也迥异。出于劳动需要,渔民的服装多宽松,易穿易脱,如山东渔民的油衣油裤、舟山渔民的大襟布衫和龙(笔)裤。海产品是海洋对渔民的馈赠,沿海渔民的食俗即是“吃海”,形成了传统的海洋饮食文化。渔民还将海产品加工为副食,如鱼干、鱼子酱、虾酱等。海草房是“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生态民居之一”,其就地取材、防风防

潮、抗寒保暖,蕴含着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风土人情。也有渔民以船为屋,把船舱分为生活、储存等不同的功能区域,展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也折射出渔民与海洋的生死相依。“水上人家”是延续至今的习俗。早期渔民的海上交通工具主要是木帆船、独木舟。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而吴民则素称“不可一日废舟楫”。

基于“天人合一”的价值基础,渔民在共同的生活区域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与集体意识,并通过民间传说、地方志、民俗文学等传承下来,反映了沿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渔民的人文精神、道德观念等,传递着对涉海生活的普遍认同,成为一种“文化景观”。

### 万物有灵是涉海生活的信仰基础

共同的信仰是维系集体意识的纽带,集中体现了民众的精神世界。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与认知水平低下,先民对异己的自然界充满恐惧感,将自然与人相比附,赋予许多自然物同人一样的情感与意志,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这其中,自然也有对海洋神灵的崇拜。

海神是渔民的普遍信仰,《山海经》记载了四海海神。唐朝时,正式册封为“龙王”。民间沿海地区普遍崇拜和祭祀的是东海龙王,即俗称的“龙王爷”。“龙王”在涉海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结婚时,新人拜龙王是重要的仪式;钻龙门、摸龙须等民间习俗,表达了渔民求子的愿望;孩子满月当天,还有“与龙王攀亲”的习俗。现如今,龙信仰(或说龙文化)已然成为海内外华人的认同符号,也是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象征符号。

妈祖是海洋保护神。妈祖信仰起源于福建莆田,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妈祖信仰从区域扩展到海内外各地。此外,民间还有很多与海洋现象、海洋生活相关的神灵信仰,如潮神、鱼神、盐神等。渔民设“祭海节”与海神沟通,如今,祭海节除祭祀海神外,还增加了踩高跷、舞龙、舞狮等民俗表演,构成海洋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

共同的信仰是渔民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提升了渔民对涉海生活的普遍认同及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共同体的认可,彰显了我国人民的精神特点。而祭海与海神信仰,则塑造了民众仁爱、乐善好施等美德,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仁”为核心构筑的道德体系。

### 敬天保民是涉海生活的价值谱系

海洋,总是变幻莫测,这给渔民的涉海生活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渔民的每一次出海都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从造船到出海,再到归航,为了整个过程的安全与顺利,渔民在涉海生活中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言语与行为习惯,这些共同构成了“敬天保民”价值基础上的对涉海生活

的普遍认同。

渔家称造船为“排船”,从准备到船只完成,都有严格的俗约,如动工要选良辰吉日,上大筋时要三牲祭祀、焚香叩头等。无论渔民抑或航海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将“翻”“扣”等字眼视为忌讳。行船的人,衣服是不允许反过来晾晒的,因为“反”音近“翻”。渔民吃饭也颇有讲究,如盛饭要说“装饭”(或“兜饭”),因为“盛”的方音近“沉”。吃饭时,不能把吃完半边的鱼翻过来,更不能说“翻过来”。饭后要把筷子扔在船舱板上,吃剩的饭菜不准倒入大海。

渔民出海也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如登船不饮酒、出海不光头、父子不同船等。就女性而言,在传统劳动分工模式下,有女子不下海、不能坐船尾等规定,但孕妇上船是喜事。此外还有船上不坐七男一女,坐船不能双手抱膝,不能将脚伸进海里等。

涉海生活禁忌,是渔民祖祖辈辈的生活经验总结和安全意识积累,既有对神明的敬畏,也反映了人类认识海洋、探索海洋的历程,久而久之,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海洋民俗。中国海洋民俗文化包括海洋物质生活民俗、海洋人生礼仪民俗、海洋生产劳作民俗、海洋信仰禁忌民俗、海洋节庆民俗等,既体现了涉海生活的特色,也彰显渔民对中华文化的普遍认同,是中国海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海事大学基地研究员)

## 探索构建全民海洋教育体系

江小林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环保教育、生态教育、海洋教育等各种教育思潮不断涌现,促进了人类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觉醒,乃至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省思。海洋教育正是在海洋问题不断出现、海洋意识不断觉醒及海洋科技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海洋教育分为专门性海洋科学课程与普通海洋科学教育,前者侧重海洋科学研究与专门的海事教育,后者是国民应具备的基本海洋素养能力,并落实于中、小学教育当中。以教育的手段激发人们的海洋意识,重构人们对海洋的价值取向,是人海和谐发展的关键。

纵观西方大国发展历程,无不把走向海洋作为国家战略,追求海洋利益最大化。当前,我国主权、安全、发展等利益日益重合,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的地位日益显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生动实践中,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故事,打好“郑和”“大航海”和平牌,将有助于澄清和消弭对中国“强而必霸”的误解。

建设海洋强国,海洋教育先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海洋教育应成为国

家海洋战略格局中的优先发展部分。从国家战略层面开展海洋教育,目的在于培养人们树立正确的海洋价值观,教人们正确认识、认识、利用及保护海洋。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海洋教育体系建设,走出一条不同于海洋霸权国家的新型海洋教育之路,意义非凡。

中国的海洋教育发展很不平衡,发展迅速的地方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在广袤的西部及内陆地区甚至是空白地带,亟须构建由国家和各级政府主导、社会大力支持和全民积极参与的海洋教育体系。21世纪是海洋世纪,坚持陆海统筹,强化全民海洋意识,提升全民海洋素养,培养国民海洋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是大势所趋,更是战略需要。基于教育科学视角,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探索构建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全民海洋教育体系。

一是基于时间维度开展。鉴于我国国民海洋意识较为薄弱,海洋素养整体不高的现状,应将海洋教育作为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涵盖所有正规和非正规教育阶段。当前,除了中小学校的海洋教育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发展严重失衡以外,对学前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这三个年龄段和群体的海洋教育也不够。针对不同阶段,教育应根据受众认知特点和思维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如对儿童应开展贴近生活、亲近自然海洋的建构性海洋教育;对中学生应开展青少年

海洋价值观和海洋基础知识体系建构;对大学生应在综合性高校和涉海高校开展除专业海洋教育之外的通识海洋教育,促进海洋意识和素养、情感态度和海洋强国观和海洋生态文明的养成。成人海洋教育则是正规教育阶段的延续和补充,可以改善既往教育体系中海洋教育缺失的现状,提高全民海洋素养。

二是基于空间维度开展。全民海洋教育应渗透于学校、家庭及社区教育之中。我国现有的海洋教育在教育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均衡现象,在学校开展情况相对较好,在社区教育层面开展情况相对较差。家庭教育层面,家长更注重所谓的“成才”教育,而对影响人生存和发展、维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海军教育宏观层面缺乏关注。社区教育层面,仅有一些公众海洋环保宣传教育,还未形成广泛的动员,更未形成公民的内化行为和自觉行动。实施全民海洋教育,除了学生、教师积极参与,家庭和社区也要加入其中,形成广泛动员,协作参与,共同推进。

三是基于形式维度开展。就海洋教育的组织形式而言,可分为正规和非正规两种,实操层面又分为课堂和非课堂两种。正规海洋教育包括各类学校海洋教育,大多以课堂形式开展,具有学科教育的稳定性和系统性,系统传授海洋知识与技能。就教育形式而言,课堂海洋教育可分为渗透式、课程式和实践活动式三种模式。目前高校专业海洋教育和非

专业海洋教育大多采用跨学科或单一学科模式的典型课程式海洋教育。而在中小学阶段,渗透式海洋教育是国内外广为推崇的一种形式,以多学科模式开展,在自然、地理、历史、公民、科学、生物等学科教育中实施。实践活动式海洋教育是以活动为载体,通过团体活动、户外拓展、主题教育、博物馆海洋馆体验、实验以及游戏等,实现教学性和教育性的统一。非正规海洋教育主要通过成人、家庭和社区及各类培训、宣传教育来完成,多为非课堂形式,具有灵活性和便捷性。目前,非正规海洋教育的工作基础还比较薄弱,需要各方配合方能有效推动。

海洋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着眼于国家长远利益,把握海洋事业发展脉搏,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发挥各类学校、科普基地、公共传媒等机构的示范引领作用,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教育部门应该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去培养青少年海洋意识与海洋素养,使其树立对海洋的责任意识和感恩意识。宣传部门应加大对海洋的宣传力度,丰富国民海洋知识,传播海洋文明,弘扬海洋文化,广泛宣传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升大众对海洋的认知程度,有效促进我国海洋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全民海洋教育体系建设。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海事大学基地研究员)

# 讲好新时代中国海洋故事

张熙

海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海洋强国建设的背景下,有效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建构更加广泛的海洋文化认同,对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提升国家形象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长久以来,最为国际社会所熟知的中华海洋文化符号有陶瓷、丝绸、郑和等,这些符号在国际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中华海洋文化远不止于这几个符号。推动中华海洋文化对外传播,应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尚和的价值理念,全方位展示中华海洋文化的和平底色,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中华海洋文明凝聚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海洋文化共识。

中国海洋文化产业肩负着传播中华海洋文化价值、提升中国在海洋事务上的影响力、提高国家海洋软实力的重任。中国各类型海洋文化遗址均呈显著集群化、特色化分布形态。因此,应大力推动海洋文化产业项目品牌化发展,增强海洋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出口能力;同时,应着力打造中华海洋文化亮丽名片和IP,助力中华海洋文化对外传播。

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海洋文化话语体系,为我国提升海洋文化话语权、参与世界多元海洋文明交流对话提供理论支撑,已经成为建设海洋强国、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紧迫任务。西方国家以“海权论”作为其海洋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长期占据着国际海洋话语体系主导地位。我国在海洋海事领域引导国际舆论走向、设置国际会议议程、制定国际秩序规则等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进程。逐步构建中华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用自己的海洋文化话语全方位、立体式地讲述中国人悠久的海洋文化历史,表达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价值观,对于推广与传播中华优秀海洋文化、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实现与世界海洋文化研究的有效对话、提升我国海洋海事领域国际话语权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助力中华海洋文化出海,应该在保持中华海洋文化话语主体性的前提下,采用其他国家人民能够理解、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和叙事体系。面对不同层次、多元的国内外受众,我们要设计差异化的话语内容,采取个性化的话语传播手段,提高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感染力、亲和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提升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质量。

推动中华海洋文化出海,应深入、充分挖掘东西方海洋文明交流互鉴的史料资源,广泛吸收和利用与海外关联度较大的符号。更要挖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中的人文交流、经贸互通、民心相通等现实故事。通过共通性海洋文化符号的呈现与传播,打造中华海洋文化圈,把中国海域打造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和谐之海。

为了促进中华海洋文化海外传播,应该对接国际文化传播理念,拓展推广的平台和方式,邀请知名外国友人、“洋网红”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媒体博主助力讲好新时代中国海洋故事,树立更加友善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例如,可以挖掘海上丝绸之路城市中的中外交流故事;也可以依托国内外媒体平台,创办中华海洋文化宣传节目,邀请一批熟悉中国并乐于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洋网红”,把富有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新时代海洋故事展示给世界,使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各国以海洋文化交流互鉴为基础,达成维护海洋和平、实现合作共赢的共识。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海事大学基地研究员)



作者:自信 文化:高榕